

《舞姬》与《伤逝》悲剧的文化成因研究

肖芷玥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沈阳 110001)

【摘要】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都存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现象。这种碰撞与融合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进步和社会发展,但也产生了诸如社会焦虑等现象。通过比较,研究了《舞姬》和《伤逝》悲剧的文化成因,即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引起的“焦虑”和特定社会环境下人物的心理归因。森鸥外和鲁迅均试图通过爱情悲剧展现封建文化对人的迫害,新思想、新文化崛起的艰难,以及作者对当时社会的反思。

【关键词】《伤逝》;《舞姬》;比较文化;文化碰撞;心理归因

【doi:10.3969/j.issn.2095-7661.2021.04.032】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61(2021)04-0119-04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Causes of the Tragedies of *Dancing Girl* and *Sorrow for the Past*

XIAO Zhi-y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China 110001)

Abstract: Both in Japan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China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re were collide and merg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While thi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f idea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has also had the inevitable side effect of creating social anxiety.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cultural contributor to the tragedies of *Dancing Girl* and *Sorrow for the Past* from a comparativ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three contributors are listed as the clash of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s, the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the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y. Through the tragedy of love, Mori Ogai and Lu Xun tried to show feudal culture's persecution of people, the difficulty of the rise of new ideas and new culture, and the author's reflection o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Keywords: *Sorrow for the Past*; *Dancing Girl*; comparative culture; culture collision; psychological attribution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作家森鸥外以其特有的抒情笔触,完成了日本近代浪漫主义的开山之作:《舞姬》。35年后,中国现代文学重要奠基人——鲁迅,创作了一部爱情小说《伤逝》。两部小说均以男主角的口吻分别讲述了明治维新、新文化运动后中、日年轻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碰壁并导致爱情破灭的故事。题材和时代背景相似的两部作品吸引了很多人探究,有学者就《舞姬》的主题和人物形象展开分析^[1-2],有的将《舞姬》主人公与杜十娘、觉慧等人物形象进行对比^[3-4],还有的就《伤逝》的情节留白与《舞姬》进行比较研究^[5]。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情节和人物分析,很少对比挖掘两部作品

悲剧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及启示意义。为此,笔者尝试从比较文化视角,立足特定时期的对外文化交融情况,探讨两部作品中悲剧的文化成因,以期对同一历史时期其他中日文学作品的理解研究有所帮助。

1 两部悲剧的共性原因: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引起的“焦虑”

悲剧往往是社会的写照,特定的社会环境给悲剧的发生提供了土壤。明治维新、新文化时期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过程也是两国各社会阶层思想变革的过程,这两部悲剧应是当时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中产生社会焦虑的体现。

【收稿日期】 2021-10-20

【作者简介】 肖芷玥(2002-),女,湖南娄底人,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19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外比较、英语语言。

1.1 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冲突

明治维新、新文化运动分别推动了日本和中国思想文化的重构,但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终究难从根本上改变旧有的社会观念。《舞姬》和《伤逝》中的两段自由恋爱都无法得到主流的祝福,最终只能在新旧文化思潮的碰撞下黯然落幕。

《舞姬》男主人公生活在明治维新时期,这是一场由统治阶级推动的改革运动,当时的日本一改闭关锁国的旧规,大力吸纳欧洲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在大大促进经济、社会、军事发展的同时,更大地改变了国人的精神世界。但社会的传统观念、政府的旧有体制仍顽强地占据社会主流。丰太郎来到德国后,德国的自由民主让桎梏已久的他产生了思想共鸣。但激情过后,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重新占据主导位置,丰太郎一步步重新走向功名利禄,最终抛弃爱情回到日本。这场新旧思潮的碰撞中,自由新思想最终败北于封建旧思想。

《伤逝》的故事背景为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这是一场由新式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民主、科学的思潮被新式知识分子所接受,但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平民阶层,社会风俗观和婚恋观仍遵循老套的封建秩序。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不到父母、亲友、社会的祝福,在风雨飘摇的社会大背景下,没有家庭支持和社会认可,同居生活举步维艰。在旧伦理中,女性臣服于丈夫,丈夫臣服于权贵,都不是超越于社会的独立个体,都有着诸般的委屈与无奈。^[6]涓生和子君把结婚作为胜利的终点,婚后却不做任何牺牲,于是无法在社会中稳稳当当地生存。新青年不仅需要一往无前的果敢,还需要一直向前的坚持。主人公对病态社会缺乏充分认识和坚持不懈的应对勇气,造成了两人分道扬镳的爱情悲剧。

旧思潮的消逝、灭亡和新思潮的成长、成熟,必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是政府由上而下强力推动的明治维新,还是民间由下而上呐喊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旧思潮此消彼长的缓慢进程中,作为盲动者,《舞姬》和《伤逝》的主人公们注定会承受更多痛苦。

1.2 东方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舞姬》和《伤逝》中男女主人公的价值观存在较大差异。丰太郎成长于典型的东方国家即日本,爱丽丝一直生活在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即德国;子君与涓生虽然都生活在中国,但两人均骨子里认可东方传统价值观,表面上追求西方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是两个爱情悲剧的重要成因。

《舞姬》中丰太郎和爱丽丝价值观上的冲突在于:丰太郎人生诉求在功名利禄,而爱丽丝的终极追求在爱情慰藉。作为日本政府培养的“和魂洋才”,丰太郎虽认同自由思想,但更热衷于功名追求。二者统一时他是欣喜的,所以认为公派留学是“扬名显姓,兴家立业的良机”^[7]。到德国后由于同僚的排挤和对西方自由的沉迷而短暂地陷入爱情。在因此失去官职后,“思乡之情与功名之心,时而压过儿女之情占了上风”^[7],最后他的选择自然毫无悬念。丰太郎的取舍体现了作者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日本“和魂洋才”的价值观塑造。森鸥外与丰太郎经历相似,回国后他开始担心日本的固有现状,认为“我身上也种着将来开花结果的嫩芽”^[8],希望唤醒更多的明治知识分子。而爱丽丝成长于先进资本主义的德国,受教育程度不高,生活在社会底层,在她的价值观里自由恋爱是一种理所应当,温暖的爱情是她的人生诉求。因此面对相同的生活困境两人的选择和反应大相径庭。

《伤逝》中涓生和子君价值观上的冲突在于:他们用新式的词汇和皮囊,装点本质上对传统父权家庭生活的渴望。涓生的爱仅有离经叛道的表面形式,他认为“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9]。他没有想到同居后的生活会如此艰难,他忘记了“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9]的承诺,眼看着爱情逐渐变味而毫无作为。子君追求爱情自由,但骨子里仍是一名传统女性。追求爱情时她是一名勇敢的新式青年,用惊人的傲气说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9]。同居后从追求民主、自由变成热衷于圈养油鸡、阿随的家庭主妇。她的出走没有底气,一旦失去涓生的爱就只能回归旧式家庭。撇去五四青年“一腔孤勇式”的爱情浮沫,浸润在子君骨子里的依然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封建基因。他们的婚姻徒有西式的形式,却有传统的本质,这使得私奔失败成为必然。

两部作品均通过情节冲突揭示东西方价值观的本质差异,让读者产生了层次丰富的人生感悟。丰太郎和爱丽丝的悲剧蕴含着个体、家庭与集体、国家两种价值观的不同取向,涓生与子君的悲剧一定意义上也是传统与现代两种婚姻观对美好的不同定义与诉求。男女主人公价值观、婚姻观的差异,成为了两部悲剧的重要原因。

2 两部悲剧的个性原因:人物悲剧心理归因的折射与反应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为传统与现代思想碰撞下的爱情悲剧,

《舞姬》和《伤逝》中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民族文化特性造就了男女主人公不同的心理归因,这是两部悲剧产生的个性原因。

2.1 男主人公负心汉形象的心理归因:日本他律道德观与中国阿Q精神的折射

两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都是负心汉的形象,但他们的文化心理不一样,丰太郎具有他律人格,涓生心怀阿Q精神。

为保持国民对国家的绝对服从,日本明治政府从法律上对道德教育进行了规定,无论是1879年的“教学大旨”,还是1882年的“军人敕谕”,都宣扬舍我去私的“他律”道德观。这种道德观使日本人非常重视他人评价,当个人喜好与他人评价标准相冲突时,个体会感到痛苦、羞辱。这一概念与后来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的“耻感文化”^[10]具有统一性。《舞姬》中日本赴德留学生有统一的行动评判标准,比如大家一起喝酒、打球、交际才会受好评,否则会被他人讥笑。成长在明治教育体系下并进入军营的丰太郎十分在意声誉,却不喜欢交际,这种离群感“直侵入自我内心”^[7],加剧了他寻求外在安慰的迫切心情。在舞姬爱丽丝那里寻得短暂温暖后,又因为舞姬群体的低贱性受到更多同胞诽谤,他无法摆脱背德感的影响。这成为了他最后选择逃离、抛弃了爱丽丝的重要心理归因。

阿Q精神是鲁迅总结的国民劣根性,面对挫折困难又无能为力时,选择自我麻醉、自我安慰或即刻忘记。《伤逝》中涓生有这种阿Q精神,当自己无法解决生活的困顿时,他选择性忘记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强化子君的责任。面对自身无法推卸的责任,他选择健忘逃避。在涓生的自述中,他“仗着”子君逃出了寂静和虚空,同居后“仗着”子君为自己料理家务琐事才有精力处理自己的事情。感情出现裂痕后又“仗着”子君的冷漠“逼迫”自己离家躲进图书馆,他用看似客观的口吻述说着爱情萌生的甜蜜和毁灭的惆怅,在自我麻醉中寻找彻底脱身的理由,最终再一次“仗着”认为子君很独立的理由抛弃子君。“仗着”一词成为了涓生阿Q式的懦弱借口。

造成两个悲剧结局的男性心理归因是两部小说中男主人公“负心汉”行为均受本国文化心理的影响。无论在他律人格中挣扎的丰太郎,还是不断以阿Q精神麻醉自己的涓生,都只能在忏悔中度过余生。

2.2 女主人公被动受害形象的心理归因:成长环境差异下失智与失语的反应

德国是女子解放运动的发源地,女性在恋爱方面阻力不大,但男女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生活能力不足的底层女性更容易遭受不平等待遇。子君生活的旧式中国,爱情面临世俗的重压,即使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知识青年也空有谋生技能无法在社会独自立足。两个女主人公一个失智、一个失语,是不同成长环境的差异,也是她们应对社会重压的心理反应。

爱丽丝成长于思想相对自由的德国,自由平等的爱情受到社会认可。因此面对学识、条件、身份悬殊的丰太郎,她依然能热情奔放、坚定勇敢地追求。但残酷的社会现实不给这个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女孩机会,爱情破灭后,失去经济来源和精神支柱的爱丽丝精神失常。在思想相对活跃的资本主义国家,爱丽丝之所以只能依附于他人,主要原因不在于思想上的束缚,而在于自身谋生能力的低下。如果爱丽丝接受过良好教育,她会在爱情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悲剧发生后自立的机会比子君大很多。因此,从自身原因上看,爱丽丝的悲剧主要是因为自身“失智”导致的。

子君的悄然“回归”和去世是一种无奈的“失语”,这是由于封建社会里女性话语权严重缺乏导致的。她与涓生的同居生活开始受到母亲的援助,结束受到父亲的介入而中断。子君受过良好教育,聪慧且勇敢,她两次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9]。这句话不仅喊出了知识女性的共同心声,更宣告了她对自己的要求:不让任何世俗秽物玷污自己,保持纯洁明净。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也没人听懂她的诉求。即使是当她向涓生敞开心扉时,涓生却误以为她有了那种西方独立的“自我”。当子君在讥笑、轻蔑的眼光中逐渐麻木时,涓生误以为她比他还坚强。子君的诉求是爱人的关注和理解,如此简单的诉求伴侣却听不懂,那么中国知识女性对解放和独立的更大诉求则更加无人在意。所以,最后子君只能在失语中郁结于心,抑郁而亡。

造成两个悲剧结局的女性心理归因是女主人公们在社会以及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最终失去了应对挫折的勇气。两个成长环境不同、性格迥异的年轻女性,在爱情和生活的重压下殊途同归地陷入了悲剧境地,一个因为缺乏教育(缺智)身处底层而失“智”(失去神智而疯癫),一个因为没有话语权(无语)而失“语”(无处诉说抑郁而亡)。

3 结语

特定时期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特定环境下男女主人公不同的心理归因,是《舞姬》与《伤逝》悲剧产生原因。探究爱情悲剧原因,就是一个以小喻大、反思社会问题的过程。在研究中可以看到,森鸥外作为近代日本历史文化转型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与自己笔下男主人公同为日本“和魂洋才”,既秉承了日本东方传统思想,又吸收了“美与自由”的欧洲精神,与日本明治维新青年共同经历了艰难抉择的心路历程。因此,在《舞姬》这部作品中,除了感受到森鸥外的苦涩和忏悔外,更能看到他对新女性的希冀。《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里注定不能长久。鲁迅先生以悲剧警策五四青年寻找解放道路,体现出对青年人挽救家国的期盼。探讨两部爱情悲剧的原因,反思过去历史进程中的遗憾和不足,不仅能对同一社会背景下其他文学作品的研究有所帮助,而且能引导现代青年进一步思考爱情与事业、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激发家国情怀,以更大的热情、更坚韧的毅力创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获得更加幸

福的人生。

【参考文献】

- [1]刘立善.森鸥外的忏悔录——《舞姬》[J].日语知识,2002(2):27-29.
- [2]蒲钰萨,李红霞.毁灭与成就——《舞姬》中丰太郎与爱丽丝人物形象浅析[J].海外英语,2020(7):185-186.
- [3]柴明俊.内容相似的两出爱情悲剧——谈《舞姬》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J].现代日本经济,1987(2):27-30.
- [4]王爱军,吴尽.《舞姬》与《家》之共通性[J].现代交际,2011(10):97-98.
- [5]藤井省三,林敏洁.鲁迅《伤逝》中的留白匠意——《伤逝》与森鸥外《舞姬》的比较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4):2.
- [6]刘红英.鲁迅小说《伤逝》中的三重空间与性别反讽[J].鲁迅研究月刊,2021(7):14-20,23.
- [7]森鸥外,高慧勤译.森鸥外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 [8]汪霞琴.森鸥外的实际生活体验在作品中的反映——以《舞姬》为例[J].北方文学(中旬刊),2019(5):37.
- [9]鲁迅.彷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 [10]鲁迅·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中华书局,2014.

(上接第91页)

【参考文献】

- [1]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2018-04-18.
- [2]李巧丹,喻礼会.基于“互联网+”的高职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提升策略研究[J].电子商务,2020(11):87-89.
- [3]彭鹏.高校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现状探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2(36):178.

- [4]叶莎莎,朱珠,彭莉萍.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研究与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20(47):39-41.
- [5]曾彩红.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J].软件导刊,2020(8):255-258.
- [6]于亚楠.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0(18):206-208.
- [7]庞超波,洪月华.“互联网+”环境下提升师资队伍信息素养策略研究[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21(1):53-54.